

兩地邊界逸事

林文禮*

分隔與交流：澳門、香港和大陸的邊界

—— 南海、番禺、香山、順德等縣商民往來於省城和澳門之間者，何止數萬？他們往往於兩地置產，於兩地行商，無從限定與判斷之。至於流民竄匪，往來如鯽，尤為雀躍。（張之洞，1887。轉引自波特，1996，頁52）

—— 1978年，深圳河的涓涓細流成為分隔兩個社會之間的鴻溝，是極端明顯的。……到了1995年，往昔邁過大陸邊境時一度產生的過度恐慌心理，已經被驚訝感歎所取代，原來深圳和香港中環地區的高樓大廈以及熙熙攘攘的活動是如此相似乃爾。（司馬特和司馬特，1998）



邊界的設立有政治和社會因素。邊界為行政管理服務，既是地區特徵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而且還影響到土地使用和空間關係。因此，邊界是多學科（特別是歷史、地理、政治學、國際法和人類學）研究的對象（參見唐納、威爾遜，1999）。

從政治地理學的角度來看，邊界、領域及主權之間的關係最為重要。在經典概念中，民族國家行使主權的領域，應與別國的分開，並由相應的邊界標定。這個概念現在受到了自上（全球化和歐盟這樣的超國團體）和自下（獨立運動）的威脅，使全球的邊界和主權變得日益模糊（紐曼、巴思，1998）。

然而，澳門和香港的例子卻十分獨特 ——

1) 它們的邊界不具國界地位，它們也不像科索沃或車臣那樣是分離出來的省份（事實上，它們連省都不是）。

2) 它們的主權不明，卻沒有國際或內部爭議，與巴勒斯坦、北塞浦路斯或臺灣的情況不同。

3) 雖然它們的邊界被認為是內部邊界，但戒備森嚴；雖然戒備森嚴，卻是全世界過境人次最多的邊界。

4) 更為出奇的是，它們目前的地位已經有了一個遙遠而確定的“截止期”。

本文將嘗試探討一下兩條邊界主權不明和過渡特徵的後果，以及它們的概念和空間後果。然後，在比較香港、澳門邊界的基礎上產生這樣的看法：它們雖有類似的法律構成，然而呈現不同的物質和社會現象。本人主要想論證的是，澳門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進展較快，反而可以借鑒之，作為更複雜的香港邊界改革試點的一個榜樣。

* Werner Breitung，漢名林文禮，德國籍學者，瑞士巴塞爾大學地理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地理與規劃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學兼職講師。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10屆（2002-2003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提交的兩篇論文。兩道分標題即為兩篇論文的原標題，總標題是本刊中文版編者加上去的。



馬偉達（Victor Hugo Marreiros）根據 18 世紀中國版畫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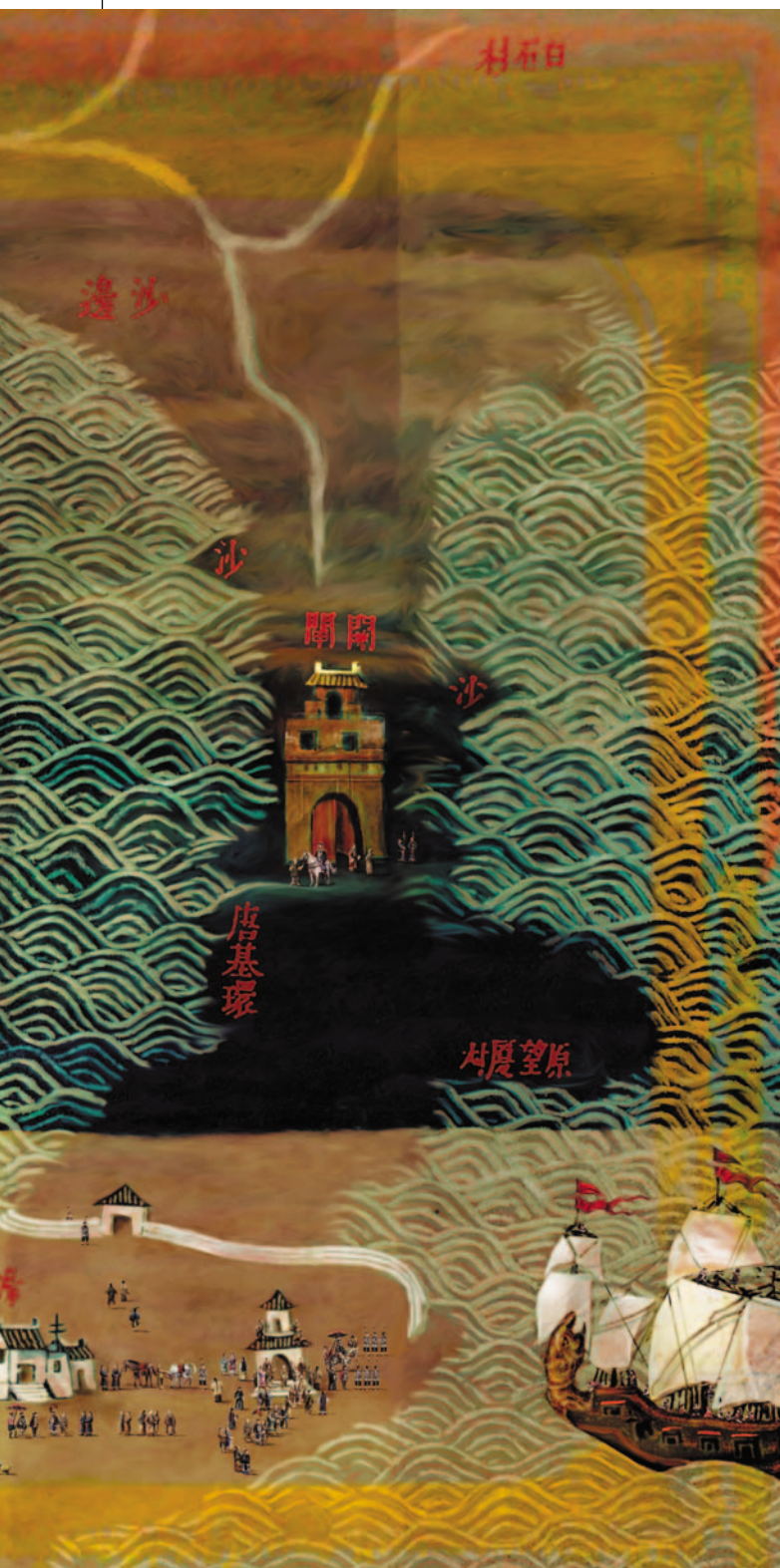
主權不明

從上文可以看出，邊界是主權的標幟，因此歷來成為主權爭議的焦點，特別在含有政治野心的地圖出現在電視新聞和教科書當中以及漁船超越假想線後遭受攻擊的時候。邊界學術研究最初的對象是邊界衝突，後來才轉到政治邊界和跨境接觸等更為敏感的方面（普里斯科特，1987；明希，1991）。

主權通常被定義為一個國家在其領域內擁有的最高權力（費爾波特，2003）。港澳的主權已不再有爭議。早在1974年，葡萄牙就單方面放棄了對澳門的主權要求並稱1999年的回歸為“行政權的移交”。英國對香港的主權要求，也在1997年壽終正寢。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着將兩塊領土設立為特別行政區，從而在事實上將大部分主權重新賦予了它們。港澳享有司法、貨幣、行政和財政獨立，很難從這一說明中一眼看出中央政府到底保留了哪些主權。

為了維護領土完整和地方治安，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港澳，但不在那裡招兵。特別行政區不主外事祇管內政，差別可以說是相當含混的（佩雷拉，2002）。行政和部分立法委員經地方代表推舉，但須北京批准；港澳行使獨立的管轄權，但要以兩個基本法為準繩，並要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解釋”。所以，主權雖然沒有爭議，但事實上卻是分享的、不十分明確的。

澳門在主權分享和務實折衷等方面，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歷史經驗（熱蘇斯，1984；拉馬斯，



奧古斯特·博爾傑：〈中國方面的關關〉
見《中國和中國人》，澳門文化司署，1990。

1999；吳，2002）。譬如在殖民統治的最後二十年，“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這個提法就基本說明，葡萄牙沒有聲稱對澳門擁有主權，中國也沒有行使主權。香港的情況則略有不同。英國當局憑藉軍力，迫使清朝統治者簽署了城下之盟（威利-史密斯，1998），因而留作懸念的空間不多，儘管中國歷屆政府從未承認過英國對香港擁有主權。

過渡特徵

兩條邊界的另一個（也許是更重要的）獨特之處，是它們的過渡特徵。它們在設立之始，就已經確定了廢除之日。依法設立特別行政區祇是為了去殖民化和國家統一進程的平穩過渡，而不是讓它們成為永久現象。

邊界的“截止期”，意味深長。正如前文所述，邊界具有社會文化和社會經濟職能，影響着人們的

身份、活動空間、安全和經濟形勢。如果特別行政區及邊界要在2047年（香港）和2049年（澳門）廢除，那麼此前必須有一個趨同過程。德國的例子表明，一體化的進程相當困難，過早地拆除東德邊界，不僅導致了經濟崩潰和人員大量外流，還造成了個人身份危機，影響社會穩定。

澳門和香港應當這樣認識，即趨同和一體化將大大減少邊界的最終廢除帶來的破壞。事實上，下文將指出，近年來已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一體化。由於這個問題和主權關係不大，而和變化的身份和活動空間更有關聯，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政治地理學的，而是社會文化地理學的。

兩道邊界

1860-1898年間，香港的第一道陸地邊界在九龍（現在仍稱界限街）。目前的邊界（含新界），先是



從灣仔島（對面山）看澳門（《澳門紀略》附圖）

在北京條約（1898）、後又是根據粵港政府1997年初達成的協定劃定的（巴薩，1997），最後由國務院1997年批准公佈（威斯利-史密斯，1998）。特別行政區的邊界和殖民時代的邊界略有差別，主要有兩個原因：1）現在務實多於戰略考慮；2）深圳河（北部邊界）河道的滄桑變化。

殖民時代邊界的相對開放，一是因為新界是去大陸的緩衝區，二是因為英國人不願意干涉居民的生活，包括他們與深圳的傳統關係。沿深圳河的第一道隔離牆，是20世紀50年代才豎起來的。到了60年代，因為大陸難民源源不斷而至，難以管理，邊境管制才嚴格起來（威斯利-史密斯，1998）。今天，邊界上有警察巡邏，主要是反偷渡和反走私。港深邊界的戒備，比珠澳邊界更加森嚴，界南有一道兩公里的封閉區，外加一道隔離牆，祇能憑特別通行證進出。

澳門的情況就截然不同。中葡雙方從未就飛地的確切邊界達成協定。1573年，中方在半島和大陸間的地峽上設立了關閘。1605年，葡萄牙（也是單方面）在距關閘兩公里開外的地方修建了城牆。然

而，雙方都祇是為了權宜之計，無意為澳門劃界。

19世紀中葉，葡萄牙開始擴張地盤，將城牆和關閘之間的地區及幾座島嶼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衝突於是加遽起來（熱蘇斯，1984；拉馬斯，1999；鄭，1999）。當時祇是兩座小島的氹仔於1851年被佔據，路環於1864年被佔據，青洲於1890年被佔據。多次的劃界努力，如1862年、1887年、1909年和1928年（希普，1997，附錄E），均告失敗。葡萄牙對半島和島嶼的管理，被視為習慣權，從來未被中方正式接受。

“澳門的邊界、國籍、主權及政府等問題，從未像其它國家那樣有明確的界定。甚至連‘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國領土’這個提法也未能真正明確澳門的地位。這個提法祇是確認，澳門問題是獨特的，用熟悉的法律術語來界定澳門是困難的，也是不恰當的”。（克雷默，1987）

與香港的情況一樣，澳門基本法也沒有提到邊界的問題。國務院對澳門頒佈的相關政令，也不如對香港的那麼明確。那份包含一張沒有清晰界限的地圖〔地圖2〕的文件聲明：

表1、經各香港口岸進入中國內地的過境旅客（單位：千）

	落馬洲	文錦渡	沙頭角	羅湖	紅磡	輪渡 ¹	機場 ¹	合計 ²
1993	650	519	406	18,315	1,447	3,435	1,414	26,187
1995	1,257	517	449	21,370	1,109	3,528	1,520	29,752
1997	2,612	478	556	27,862	810	3,412	1,630	37,360
1999	4,804	497	600	38,119	934	3,017	1,560	49,532
2001	6,575	560	692	44,106	1,149	3,259	1,699	58,03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暨普查署：1996；2000；2002（表6.9）。（1）根據移民局通報增添了2001年的資料。（2）不含貨物和郵船。

表2、經各口岸（1998-2002）進入澳門的過境旅客（單位：千）

	關閘 ¹	內港 ¹	路氹區 ¹	機場 ²	外港 ³	合計
1998	6,153 ⁴	150	0	598	5,363	12,264 ⁴
1999	11,632	186	0	742	5,046	17,607
2000	16,840	306	96	903	5,656	23,755
2001	20,989	162	206	934	5,890	28,181
2002	23,903	146	289	975	6,322	31,634

資料來源：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2000、2002以及該局的通報。

（1）全部來自中國內地。（2）在澳門機場降落的航班約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內地（1999年33.7%、2001年35.9%）。

（3）所有的船都來自香港，但自2002年3月起，每天有兩班船從深圳機場抵達澳門。（4）在1998年資料收集電腦化之前，澳門居民在關閘的過境人次被大大地少算了。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範圍，包括澳門半島及氹仔島和路環諸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北區和廣東省珠海市的拱北接壤。澳門特別行政區對關閘拱門以南的地域行使管轄權。拱北（珠海）邊檢前旗樓和關閘拱門以北之間的土地管理形式保持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維持對前澳門海域的管轄權。”（澳門特別行政區，1999）

後兩個問題，即拱北的“無人區”和所謂的“傳統水域”（澳門海域從來未經界定），就被高明地規避了。

澳門的邊界管制和香港也自然不同。澳門地域狹小，拿不出像新界那樣的緩衝區。關閘兩邊都為密集的商业住宅區緊接包圍，因此必須排除最小封閉邊境區的概念。另外，雙方的陸地邊界祇有幾百米，而偷渡和走私主要發生在海域，特別是在雙方的填海造地大大縮短了到澳門西海岸的距離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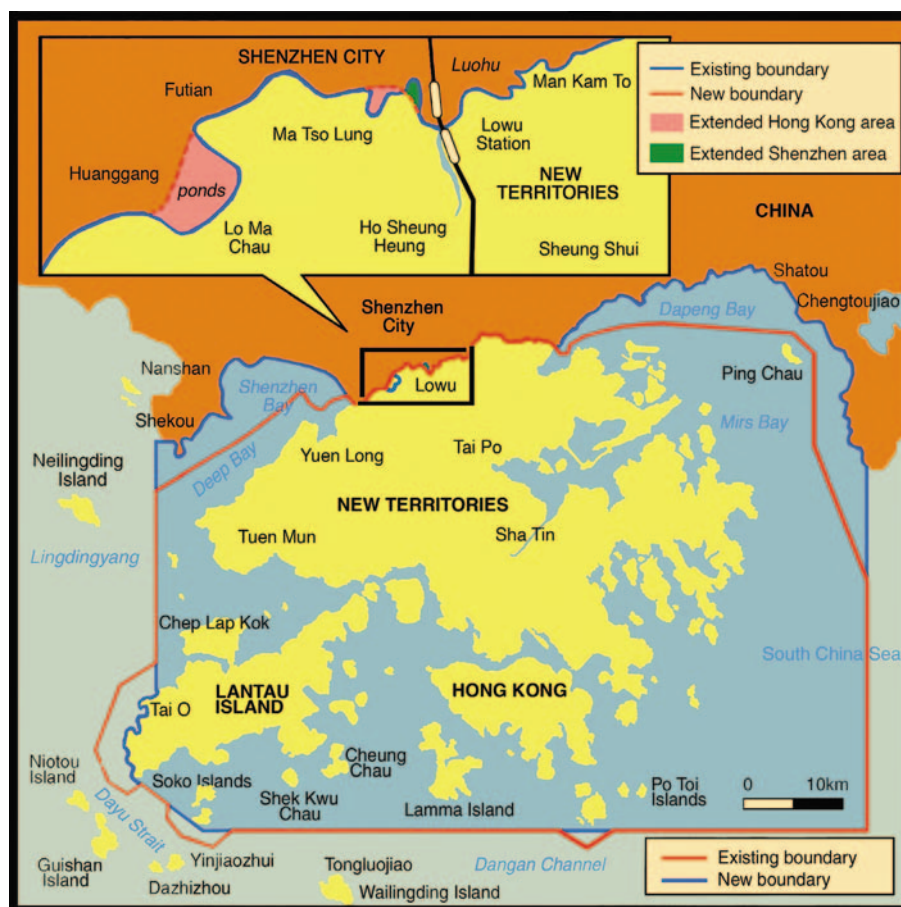
通關

香港的跨深圳河通關點，分別為原有的文錦渡口岸、羅湖口岸以及沙頭角（1980）和落馬洲（1989）兩個新陸地口岸。後者為最大的陸路口岸，全天候運作，其它的半夜就關閉了。除了這些官方口岸外，還有兩個關口和小橋，主要供在邊界另一方有傳統土地使用權的農民使用（威斯利 - 史密斯，1998）。此外，在被邊界線一分為二的沙頭角村，還有一條中英街，當地居民也可以通關。

雖然絕大部分通關旅客都是經深圳河過關（羅湖 76%、落馬洲 11%），約有 10% 左右的人使用其它口岸如機場、碼頭或火車站（見表 1）。這一增長主要是因為香港居民到深圳的短途旅行造成的（林文禮，2002a、2003）。大約 93% 的通關者為香港居民，內地居民過關的祇有約 5%（規劃署，2002）。

雖然港人到內地旅行相對自由，但內地人到香港旅行則受規定限制，儘管 2002 年取消了配額限制和 2003 年新出臺的個人遊政策帶來了逐漸的變化。內地居民現在可以以旅遊、商務、探親訪友、工作、培訓或學習、特殊情況或過境轉機等的名義進出香港（保安局，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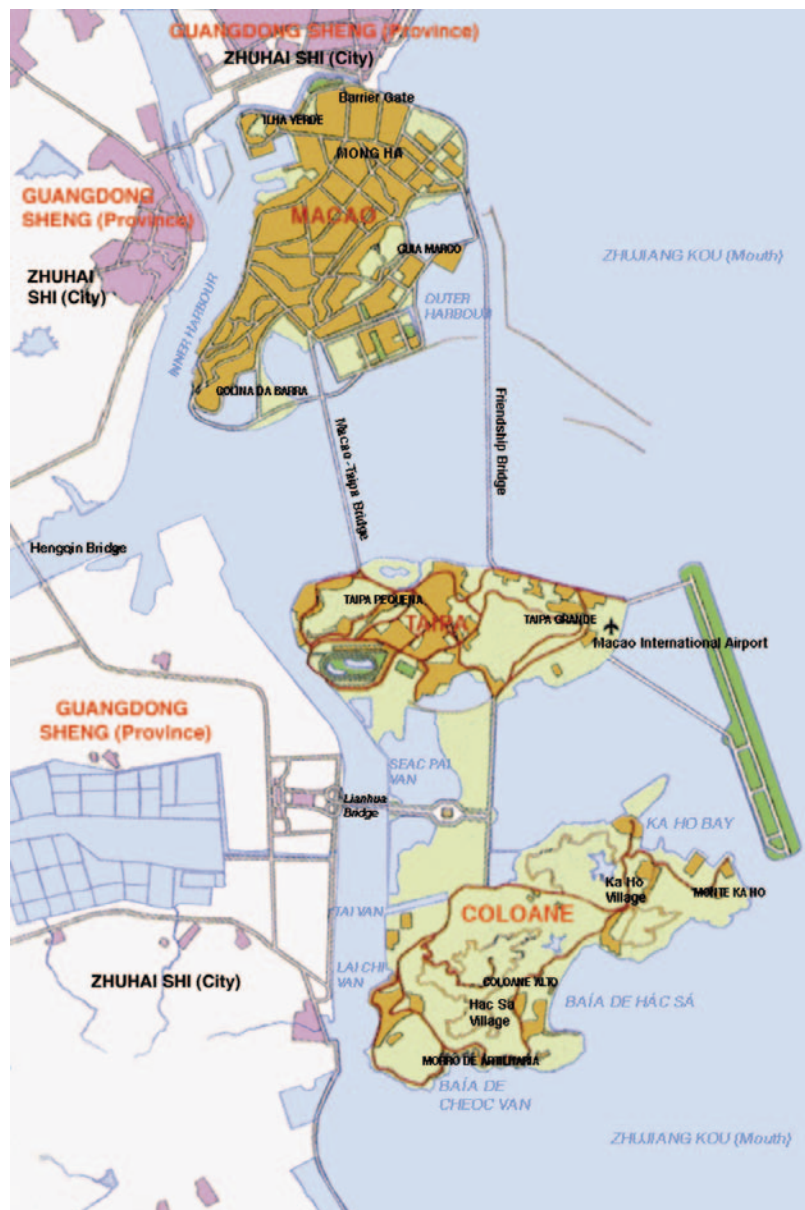
雖然港人到內地旅行相對自由，但內地人到香港旅行則受規定限制，儘管 2002 年取消了配額限制和 2003 年新出臺的個人遊政策帶來了逐漸的變化。內地居民現在可以以旅遊、商務、探親訪友、工作、培訓或學習、特殊情況或過境轉機等的名義進出香港（保安局，2002）。



〔地圖 1〕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邊界和殖民時代的略有不同（根據巴薩 1997 年地圖重製）

澳門傳統上祇有關閘一個陸路口岸。2000年3月，聯接澳門路氹區和珠海橫琴島的新蓮花大橋的開通，使之又增加了一個口岸。鐵路聯接已有規劃，但尚未實現。機場和兩個港口也設有邊檢站。除了上述官方通關口岸以外，路環碼頭和橫琴島之間還有一個輪渡設施，以前兩邊都可以用，現在僅限橫琴島上五個村的村民專用。

因此，澳門的通關人流大部分集中在一個口岸。74%的通關者及97%的前往大陸者使用關閘（見表2）。其中81%為澳門居民、9%為內地居民、6%為香港居民。這與香港的不對稱現象大同小異。澳門居民的比例較之香港要小得多，這並不奇怪，因為澳門本身就地域狹小。真正令人咋舌的是，澳門的過境人數幾乎為地域廣闊得多的香港的40%。這些數位雖然有人為偏差（有些水客帶貨賺錢一天過境多次），但澳人似乎比港人的過境次數多，而且過境增長率也高得多。



〔地圖2〕澳門特別行政區

活動空間

地理研究的一個方面，是活動空間，即人們到處走動並感覺舒服的範圍。活動空間影響我們的地方概念（意識空間）、人際交往和身份認同。個人或社會團體的活動空間是可以確定的。社會標準如年齡、教育程度和職業，以及外部因素如交通系統、實際障礙及想象障礙，對活動空間都有影響。因

此，活動空間可以反映政治邊界的社會和空間影響（沙納 2000）。

我們在澳門（2003年3月，555位反饋者）、珠海（2003年3月，395位反饋者）、中山（2003年2月，291位反饋者）進行了調查及一個跨境旅行調查（2003年5月，1,001位反饋者），從中得到了一些有關跨境活動空間的資訊。頭三個調查的對象，

為各市兩個不同中心區的普通城市居民；跨境旅行調查是在澳門的關閘進行的，對象僅為雙向出入境人員。這個方法和香港定期進行的官方跨境旅行調查的方法是一樣的。（規劃署，2002）

上述調查顯示，澳門和珠海在活動空間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據澳門的調查，祇有1%的反饋者從未去過鄰近的珠海或中山。在關閘被訪的澳門居民中，有57%的人每週至少去大陸一次，每月不到一次的僅為16%。大部分旅行是短途的：82%的人一般祇去珠海，11%的前往中山，更有甚者，52%的通常祇到關閘那邊的拱北。這個模式表明，總的活動空間沒有受到太嚴重的阻隔。嚴格的邊界管制通常會阻礙短途日常交往，而不是偶爾為之的長途旅行。

然而，有必要在此說明兩點：1）這些模式因旅行目的不同而異，35%的人目的主要是採購，29%的為休閒，19%的為探親訪友，祇有9%的為工作，6%的為經商，4%的為上學（見表3）。到珠海的主要理由，顯然是那邊的商品和服務物美價廉。一方面，邊界減少了工作和上學的人數；另一方面，它又鼓勵人們採購，因為兩邊的商品

存在差價。在珠海採購，現在已是普遍現象。（澳門管理協會 2000，布魯寧，2000；劉，2001；《新華澳報》，2002）澳門零售業因此深感沮喪，消費者卻因此感到歡欣，整個經濟也可能因此興旺起來。在珠海購買便宜貨以及參與非正式的穿梭貿易（如蔬菜和免稅商品）的可能性，給澳門社會的下層提供了一種社會減壓。

表3、經港澳邊界進入內地的過境旅客
（按主要目的區分。單位：%）

主要目的	澳門 ¹		香港 ²	
	所有旅行 ³	澳門居民 ⁴	所有旅行 ³	香港居民 ⁴
採購休閒	56	64	39	42
工作	13	9	9	4
商務	8	6	29	30
家庭	18	19	18	20
其它	4	5	4	3
合計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香港規劃署，2002；本人的駐澳調查（2003年5月，樣本數：1001人）

（1）僅為關閘資料。（2）各口岸資料。（3）雙向通行。

（4）去內地旅行的目的。



深圳河邊界一景（參見〔地圖1〕） 林文禮攝



香港新界到深圳的邊界。注意與前面一頁照片相比，兩者的土地使用存在着巨大差別。 林文禮攝

第二點與過境人流的不對稱有關。儘管幾乎每個澳門居民都時不時過境，我們的調查發現，68% 珠海和中山的反饋者從未到過澳門，29% 的人也沒有去那裡的興趣。他們去澳門的理由，大多是工作、休閒或探親，而不是購物。

香港最近也碰到了類似的趨勢，祇是規模要小得多。新界北部的居民，尤其愛去深圳買便宜商品和服務（恆生銀行，1999；規劃署，2002），但是次數還是明顯地少。據統計，澳門居民平均每年每人過境45次，香港居民的過境次數1995年為4.7次，2001年上升到8.7次。這個差別的主要原因是，香港中心區到深圳的地理距離遠，到邊界的費用高，以及心態不同。從香港中心區到深圳，坐火車要花近一小時，費用為40圓港幣。必須指出，有20圓港幣的車費，那是從上水到羅湖那最後四分鐘的。這說明當局不鼓勵跨境活動。香港最近通過徵收“通關稅”的決定，也強調了這一點。然而在澳門，你既可以花2.5澳門圓坐公交車去關閘，也可以步行前往，通關稅的提案遭到了否決，因為它有違公益。（《新華澳報》，2002）

儘管港人不如澳人那樣經常過境，但經常過境的港人數目也在猛增。這些人絕大部分在深圳有家庭關係（配偶或子女）或工作（政府統計處，1999、

2001）。據估計，每週從香港過境至少一次的，有447,500人（約等於澳門的總人口）；從大陸過境至少一次的，有48,800人。後者幾乎全是住在深圳的香港居民（規劃署，2002；林文禮，2003）。上述兩個數位可能都有一些偏高，但顯然有一支不到人口10%的先鋒人群，是經常跨境的。他們的活動空間，已經像澳門的那樣一體化了。如果通關變得更容易，在深圳居住的現象更普遍，那麼他們的人數還會增加。但是和澳門相比，香港的情況依然會因地理因素而有所不同，英國人用作緩衝區的新界，將仍然發揮阻隔活動空間的作用。

身 份

前文提到，澳門的活動空間一體化程度比香港高的理由之一，是心態的不同。較之港人，澳人在文化上和中國更親近。除了毗鄰因素外，澳門人口中內地出生的比例較高（澳門為47.4%，香港32.5%。以上數位均來自港澳2001年的普查），以及對前殖民政權的認同程度不同，也有關係。

對港人身份的研究認定，自1967年（當時的反殖民浪潮未能贏得大多數香港居民的支持）以來，港人中除了原有的英國或中國身份外，還產

生了明確的港人身份（樁，1998）。當時，大陸實施的毛澤東政策，其缺陷已經暴露，而殖民政策卻相對寬容和平等。從那時到90年代末，港人更加認同香港及其政府而不是大陸。祇是到了回歸之後，對中國的認同才有所增加，但絕大多數港人依然自視為“香港人”、“香港華人”，而不是“中國人”（德高雅，1997；林文禮，2002b）。

澳門的情形有所不同。據說澳門華人一貫認同中國而非殖民政府。除了其它原因，這可以歸因於教育制度的不同（高希，2002）。雖然我們的部分訪談證實了上述觀點，但我們依然發現了顯著的地方身份。在我們的調查對象中，有40%自稱“澳門人”，27%自稱“澳門華人”，祇有32%自稱“中國人”（2003年5月，樣本數：730名澳門居民）。這些數位和香港的沒有太大區別，那裡有33%的被訪者自稱“中國人”。因此，雖然港澳人在身份認同上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並不能看作是澳門的活動空間更為一體化的主要原因。

一體化過程的比較

港澳和大陸的一體化進程，經歷是同樣的。但在澳門，這一進程已經發展得相當遠了。我們可以從空間（物理）整合、意識和活動空間以及身份等方面得出這個結論。對於澳門居民來說，內地的能見度更高，更容易去，也更熟悉。香港居民則不這樣認為。澳門人利用了優勢，特別是邊界那邊的低廉物價。然而他們尚未產生區域身份，尚未發展密切的個人關係。在澳門的反饋者中，祇有28%的人在珠海有朋友，25%的人在中山有朋友（2003年3月調查）。與之相反，31%的珠海反饋者在澳門有朋友，27%的中山反饋者也在澳門有朋友。

本文沒有詳細探討經濟整合問題。就經濟一體化來說，澳珠（坎姆，1987；普塔克，1990；埃德蒙，2002）落後於港深（孫，1998）。納富斯

（2002，註3）甚至聲稱，1989年的澳門是中國四個經濟區中整合最差的，區內貿易祇佔它整個貿易的14.5%（臺灣27.6%，香港32%，廣東88%）。原因可能是出於廣東商品經香港的轉口貿易。

通過依法設立特別行政區來使港澳一體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這個實驗可以為將來臺灣的整合提供經驗。雖然這個構成有一個過渡期（分別到2047年和2049年止），但我們應當明白，五十年可以說是一彈指間的事。祇有當那段時間可以被用來縮小差別時，一體化才能夠發生，一方才不至於覺得被另一方“吞併”。在過去的幾年裡，兩條邊界都已經明顯地失去了屏障功能，但有人指出，這個現象祇是單向的，仍然強烈地依賴物價差別因素。

總的來說，澳門在實行一體化的進程方面，條件比香港成熟：

1) 因珠海在外貌上的接近使之更清晰可見，更容易進入，因此澳門人輕而易舉地就將它納入了自己的活動空間。

2) 地域寬廣的珠海吸納澳門（參見聖胡安1997）比深圳吸納香港的可能性要大些。

3) 澳珠的貧富差距比港深的小。

4) 由於殖民史的不同以及近年來澳門吸納的移民數量大增，澳人對一體化的心態更開放。

5) 許多澳人的根就在附近的內地城市（珠海、中山、順德等），並在那裡有親屬。

6) 在政治方面，澳門在國際上披露得較少，不如香港那麼敏感。因此，一體化的線路圖將先在澳門實施。至於到珠海的邊界的滲透性將如何進一步提高，活動空間如住房、工作及就學將如何進一步整合，身份特徵和人際關係將如何發展，邊界的劃定和管理又有哪些新的技術解決方案，我們將拭目以待。

〔謹向幫助我進行上述調查的學生表示誠摯的謝意；感謝哈羅德·布魯寧（Harald Bruning）提出的寶貴建議，它們無不加深了我對澳門的認識。〕

與邊界共存：克服其不便

邊界和邊民

澳門人屬於邊民，生活在政治邊界周圍。邊界對澳人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們的身份、思維乃至日常選擇，都受到這一空間環境的影響，正如作為中國人生活在後殖民時代或城市環境中一樣。謹此探討一下邊界的影響、邊民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利用邊界或克服邊界給日常生活造成的不便。此既可視為澳門文化研究的組成部分，也可以看作是對邊界和邊民研究領域的貢獻。

文化和社會地理學家一直在致力研究各種區域環境下的邊民（馬丁內茨，1994；威爾遜、唐納，1998；哈克里、卡普蘭，2002）。他們使用的是社會文化研究法，研究內容涉及受邊界影響的人和社會，他們的行為和思維反過來也影響到邊界社會的特徵。但這也是一種地理學的研究法，因為它研究的對象是特殊空間環境中的人。由於生活區域靠近邊界，這些人便被稱為邊民。因此這也是一個規模

問題。儘管政治邊界的影響波及全國，但它對邊境地區的小規模影響值得特別的關注。

邊民具有哪些特徵？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邊界的開放程度和走向，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和經濟變化率。總的來說，一些案例研究表明，邊民因瞭解和接觸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規章制度而獲利良多。譬如他們在購物、住房、婚姻和勞務市場等方面可能有更多的選擇。他們也可能具備專門的跨文化技能。至於他們是否建立了跨境人際關係網、活動空間、甚至身份特徵，則視具體情況而定（參見克萊門尼、布封，1994；舒爾茨，2002；桑德納、艾德，2002）。除了多重空間身份（國家的、地區的和地方的）以外，還可能出現明確的跨境地區身份。

上述研究的絕大部分，是針對歐洲和北美的邊境地區進行的，也有一些出版物研究了香港和中國大陸邊境的社會文化諸方面（斯克萊爾，1986；古爾丁，1995；斯馬特、斯馬特，1998；布雷東，2002；索，2002），但是以澳門為對象的研究還不多見。最



面臨拱北的澳門邊檢站一景（澳門新聞局圖片）

近有幾位作者寫了澳門人的身份問題(如魏, 1999; 鄭, 1999; 高希, 2002; 伯利 2002), 但他們的研究重點是葡中文化在後殖民時代的共存問題。我在前篇從政治、職能和社會文化等不同角度介紹了珠澳邊界, 並與深港邊界作了一番比較。本篇將把社會文化邊民研究法用於澳門研究, 它主要參照的是訪談收集來的定性資料。訪談的特定目的如下: 1) 瞭解邊界的日常體驗; 2) 評估邊界是否成為交際和活動的障礙; 3) 瞭解邊界對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的影響; 4) 檢討上述三個方面的變化。

除了定量調查外, 我們還向二十二位澳門居民及一位中山居民進行了定性訪談。被訪者是通過私人關係聯繫的。我們試圖把他們的特點(年齡、性別、職業和出生地)和澳門最近的人口普查特點相匹配。然而一個祇有二十三人的樣本, 是很難代表各個方面的。因此, 想從這些訪談中得出任何量化結論都是不合理的, 但它們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上述定量分析所觀察到的理由和態度。

訪談雖是開放的, 但有一份事先擬好的問題清單作指引。訪談時間在 45-90 分鐘之間。根據被訪者的喜好, 大部分訪談以廣州方言進行。訪談記錄事後由採訪者譯成英語。以下的探討主要依據訪談記錄。

澳人生活中的邊界

根據澳門 2001 年的人口普查, 44% 的澳門居民為澳門出生者, 47% 為內地出生者。在內地出生的澳人中, 79% 出生於廣東(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2002, 29)。與之類似, 我們的被訪者在澳門出生的不到一半, 在廣東出生的比例也差不多。祇有兩個例外, 一位是印尼出生的華人, 自小就來到澳門; 另一位出生於香港, 父親和祖父均為澳門人。在廣東出生的被訪者中, 祇有兩位是珠三角以外的。大部分被訪者不是在澳門就是在鄰近地區長大, 祖籍分別為中山、珠海、佛山、東莞和新會。在澳門出生的被訪者中, 除了一兩個例外, 全部是澳門出生的第一代。

大部分家庭似乎都有親戚在內地, 並和內地有密切往來, 因為所有被訪者小時候都去過內地, 祇

有那位印尼華人在 18 歲前沒去過內地。一位現年 18 歲的姑娘, 雖然在澳門出生, 從小卻一直和外婆住在廣東。一位內地女子 1998 年來澳門生孩子, 如今在珠海撫養孩子。情況大同小異, 在內地出生的女子中, 來澳門的理由無非是婚姻、生育和家庭團聚。大部分男子在 20 多歲時(70 或 80 年代)來澳門找工作。其中有的在澳門有親戚, 但在移民前親眼見過澳門的卻很少。

被訪者對澳門第一印象的描述截然不同。有人對殖民建築、夜生活或高樓大廈產生了深刻印象; 很多人說他們一開始就感到非常失望。澳門和內地沒有甚麼區別, 祇是當時的工廠和超市較多, 商品更豐富。有兩個人指出, 關閘後面的北區最亂, 給人的第一印象特別差。這個區主要是在 20 世紀 90 年代建設的, 是澳門大部分新移民的家, 也是澳門最“中國化”的住宅區(克雷頓, 1999)。

談起對內地的初訪, 澳門出生的被訪者, 要麼沒有甚麼特別記憶, 要麼就是印象很差。大部分人形容內地骯髒、落後、經濟不發達, 他們對內地當時的印象倘非因自己不快的經歷造成就是偏見的結果。

通關

早年通關要比現在困難和麻煩得多。據一個人說, 當年的人不像現在去內地都有旅行證件, 你必須加入工會或居委會, 才能得到一張證明你“政治態度好”的卡片。入境者必須在拱北關閘出示這張卡片, 才能換到一封介紹信, 標明旅行目的、社會關係等。這封介紹信就是他們在內地活動的護身符。除此之外, 有些被訪者還記得邊界官兵的粗暴態度, 甚至在所謂的“黑屋子”裡受過審訊。有一個人回憶說, 大陸那邊的電腦以前經常出問題, 每逢這種情況, 大家祇好耐心等待, 直到技術問題解決為止。拱北關閘人頭湧湧, 麻煩不斷。澳門方面祇是抽查一下而已。據一位被訪者回憶: “當時祇有幾個關員和幾張桌子。我們站着排隊, 關員祇查一下幾個人的身份證, 所以很快通關。”這種做法詮釋了為甚麼 1998 年前澳

門沒有可靠的過境人數資料的原因。在官方統計中，澳門居民經關閘過境的人數，1996年7,098人次；1998年4,403,810人次（澳門特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當然，1998年前的資料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反映的祇是抽查結果。1999年以後的資料才逐漸可靠起來。珠海的統計（表2）反而能較為真實地反映過境人數的劇增，儘管它本身也存在前後矛盾的漏洞。

表1. 被訪者樣本與澳門2001年人口普查的假設代表樣本之比較

人員類別	普查數字	選查人數	實查人數
性 別			
女	52	12	12
男	48	11	11
合計	100	23	23
年 齡			
10歲以下	12	3	0
10+	18	4	3
20+	14	3	6
30+	18	4	6
40+	19	4	2
50+	9	2	4
60+	10	2	2
合計	100	23	23
出生地			
澳門	44	10	9
內地	47	11	12
香港	3	1	1
其他	5	1	1
職 業			
學生	38	9	4
工人	21	5	2
職員	8	2	2
銷售/服務	9	2	2
專業人員	5	1	4
行政人員	2	1	4
失業人員	3	1	1
退休/家庭主婦	13	3	4

表2. 珠海拱北邊界的過境人次

年份	人次（單位：1000）
2001	46,410
2000	38,570
1999	30,140
1998	28,000
1997	28,190
1996	27,760
1995	25,000
1994	23,480
1993	22,960
1992	21,100
1991	19,602F

資料來源：珠海歷年年鑒。

通關人次的遞增，促使邊界方面調整組織結構，大規模地擴大設施。在珠海方面（拱北），一座有66個檢查通道的聯檢大樓於1999年剪綵使用；澳門方面也有一座新大樓剛剛竣工〔案：其時乃2002年〕。在一次訪談中，一位人大代表（兼任珠海邊檢站監督員）給我們講述了他親歷的變化：

1999年澳門回歸之前，邊檢站的軟硬體都很差，設備落後，人員培訓也不盡人意，通關很費時間。1979-1999年間，通過邊檢站進來的人數遞增。邊檢官兵面臨的壓力增大，但他們的素質卻相對較低。當時的人事制度基本上是軍事化的，人員流動率高，工作質量不一，對工作也不夠專注。改革之後，人事結構改成了公務員制，工作態度有所好轉，團隊精神也有所加強。關員上崗前要經過培訓，另外還建立了獎懲制度，相應的規章也逐步完善。譬如，關員不可以收受紅包利市（現金禮包）。

另外，新聯檢大樓的竣工也改善了硬體。中央電腦大大改善了對各種邊檢活動的監控。類似“身份證”的回鄉證開始使用，當然電腦控制的過境技術仍在完善。另外還成立了監督處，任命珠澳各界人士為監督員。監督員可向邊界領導反映在邊界發現的任何問題。他們每年都開會聽取民意。



自 2003 年夏推出個人旅遊新政策以來，內地來澳門的遊客數量大增。（林文禮攝）

大部分被訪者證實，關員的態度、組織結構和技術，都發生了積極的變化。另一位還說：

過關最顯著的變化就是電腦化。過去檢查都是手工操作，不僅效率低，還令人生氣。澳門回歸之後，特別是新聯檢大樓投入使用後，進出條件就提昇到了先進水平，不僅大大提高了通關效率，同時也使人感到方便。除了設施以外，邊檢站的環境和關員的態度也好了很多。

然而，大部分被訪者仍然認為，澳門的檢察站更加方便，關員也更友善。許多人同時強調，雖然有了很大的改善，通關還是相當麻煩的，特別是在週末和節假日。

儘管機場、蓮花大橋和外港碼頭的使用，使指定的邊檢站由兩個增至五個，但 97% 的人仍然通過關閘到內地。被訪者中很少有使用過其它邊檢站

的，雖然他們每月平均使用關閘 2-3 次（不包括一個每天至少過關一次的被訪者）。澳門政府的資料表明，澳門居民每年至少到內地四十次（據澳門 2001 年鑒、表 3.1.1 和 3.2.20 計算）。該資料存在一定的人為失真，因為有些走私小商品的水客一天過境多次。倘除開那些人，該資料可能會降低十個百分點，但平均起來仍然每人每月過境三次以上。

小商品走私，通常有兩種方法，您不僅可以親眼目睹，而且許多被訪者也說那是一種特別值得一提的過境經歷。首先，一些食品如肉類是不能合法帶進澳門的。這一規定被私下解釋為保護官方特許進口商的利益。這些商品在珠海要比澳門便宜得多，因此有些人就在過關時把肉綁在褲子裡的大腿上。這雖然聽起來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但在邊界上卻屢見不鮮。另外，還有很多人幫小檔主帶免稅商品過境（梅，2002；夏，2002）。攜帶規定數量的煙酒過境，在澳門雖然不能說不合法，但珠海當局

卻試圖予以制止，因為那樣做有損關稅收入。有相當一部分家庭，特別是那些住在關閘附近北區的，把小商品走私看作自己的營生，他們差遣孩子或請陌生人將預先裝好的一瓶酒和一條煙帶到珠海，每次可以賺得約 25 圓澳門幣，其中 15 圓澳門幣作為帶貨人的報酬（梅，2002）。講到這些交易和走私活動時，一位被訪者說：“邊界不像邊界，反倒像趁墟（趕集）。”

這些現象表明，邊界的確是個人消費的屏障。這一屏障因管制和處罰而得到加強。一位被訪者說，她買的東西被沒收過一次；另一位被懷疑走私的則說，自己被拱北的關員粗暴地搜身和審問過，可是他們甚麼也沒有發現，事後居然連一聲道歉都沒有。另一方面，水客的行為也表明，控制和處罰的力度還不夠大，未能起到阻止人們鋌而走險的作用。兩個邊檢站之間的無人地帶特別不着邊際，因為澳珠方面都不能在那裡對水客採取行動。

移民管制的實施，同樣困難重重。拱北每年都發現數以百計的偷渡客，有的躲在車裡，有的甚至

藏身於大件行李下，還有的偽造或使用他人旅行證件（毛，2003）。更多的人據說是非法游過珠澳之間的水域，或使用旅遊簽證逾期不歸。此外，“勞務旅遊者”比偷渡客還要普遍。現在，以旅遊、經商或親人團聚的名義到澳門默上幾個月是比較容易的事情。許多內地人就憑這類簽證來澳門找工作，有幹堂倌的，也有當地盤工人、傭人或暗娼的。這樣做雖屬非法，但有一位被訪者說她看到一家中介機構介紹這類保姆，開價比菲傭低得多。公共輿論對這種“勞務旅遊”持不同看法，因為它既壓低了工資，又降低了開支。邊界的日益開放，使珠澳兩地的物價和工資漸漸靠攏，海關和移民當局在阻止“勞務旅遊”方面，越來越感到無能為力。

跨境生活方式

雖然大部分澳門人經常過境，但到珠海拱北和香洲以遠的卻不多。有些澳門人到珠三角地區的其它市縣探親訪友或做生意，但大部分被訪者祇去拱



澳門關閘的水客正在做帶貨過境的準備 林文禮攝

北，並在那裡購物、休閒、吃飯或娛樂。這就將他們的活動範圍局限在澳門以外的一個相對較小的區域。很多澳門人對拱北購物中心以外的地方並不熟悉。大部分被訪者不知道珠海的許多街道和公車線路。他們雖然不帶地圖，但這並不說明他們就熟門熟路，而是因為不太會看地圖（他們覺得問路要比看地圖方便）。所有的被訪者對澳門都比珠海熟悉。因此在活動空間和熟悉程度方面，邊界的確造成了差別。邊界也是人際交流的屏障，至少對年輕一代來說是如此。雖然經常過境的人各個年齡層次的都有，但是年輕一代在邊界那邊有朋友的卻不多。在八位 30 歲以下的被訪者中，有六位在內地沒有朋友；但在十位 30 歲以上的被訪者中，祇有三位在內地沒有朋友（四位被訪者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典型的區別在於：老一代和內地有着密切接觸，他們過境的理由既包括社交因素，也包括消費因素；而年輕一代則和澳門朋友結伴而往，目的純粹是消費和娛樂。有一位被訪者說，這類旅行對她來說是一種趕時髦，雖然她本人對內地並沒有那麼濃厚的興趣。

此外，訪談還凸現了另一個可以被稱為真正的邊民的群體。在他們看來，邊界兩邊都是正常活動範圍。他們的工作、家庭生活、學習乃至社交，都是在兩邊進行的。以下便是這部分邊民的例子：

A 先生住在澳門，但每天要過境一到兩次。他辦了一個兩地車牌，因此在兩邊都能駕車。他以前在珠海設廠，現在仍在內地做生意。他在兩邊都有很多朋友，而且還投身政治活動（人大代表、珠海邊檢站監督員）。雖然他在內地有房子，但是他的家、家人以及主要工作都在澳門。

B 太太是內地居民，1989 年起住在珠海，並在那裡結識了一個澳門男人，婚後九年在澳門生下一子，以後便以兩年期的探親簽證到澳門生活。她很想有一張澳門身份證，但實際上卻寧願住在珠海，因為那裡不僅生活環境好，朋友也多。

C 先生珠海出生，但很早就移居澳門，後來在珠海娶了一位太太，跟他到澳門，育有兩個孩子。雖然母子現在都持有澳門身份證，但還是回了珠海。C 先生仍在澳門工作，在澳門有一套住房，並經常在

那裡過夜。他的家人有時也來澳門小住，祇是更多的時候默在珠海，因為孩子在那邊上學。

D 先生祖籍中山，1979 年移民澳門，後來又回到原籍。現在他住在中山，但經常去澳門。

有一個被訪者在內地既有房子，又有兩地車牌。有趣的是，C 先生想讓孩子在珠海上學，說那裡的教學質量高。但是我們發現了兩個正好相反的例子：孩子們每天過境到澳門上學。在珠海的妻子沒有取得澳門居住證的情況下，孩子們往往都在澳門上學。這種現象可能變得日益普遍，因為珠海（特別是中山）為港澳人士修建了許多商品房小區。有些被訪者提到有朋友住在那些區裡。他們顯然和內地鄰居和睦相處，絲毫沒有格格不入之感。在澳門北區和這些商住區裡，澳門人和珠海人之間的隔閡已經很模糊了。

當問到是否願意考慮住在珠海而在澳門工作或在澳門工作而住在珠海時，大部分被訪者表示不願意，因為過境仍然相當麻煩，而且耗費時間。他們認為那種生活不穩定，也不方便，特別是邊檢站半夜就關門了。在珠海工作而不是在那裡生活被認為更易接受。然而，相當一部分被訪者願意住在珠海。有些人甚至認為那樣更好，因為那邊物價低廉，環境更美。“那我就可以在澳門賺錢珠海花費了。這樣太棒了！”一位被訪者說。

據一位女性說，很多澳門男人都想住到珠海去，因為那邊選擇配偶的機會更多。雖然被訪者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但眾所周知的是，配偶不僅局限於合法的婚姻對象，還包括“包二奶”和婚外情。澳門大學在一次文學作業中，要求學生以“跨境”為題寫一篇小說。有趣的是，大部分小說寫的都是跨境婚外戀（凱倫，2003），結果與此不謀而合。除了消費和工作以外，這顯然也是邊界問題的重要一面。

地方概念

在比較珠海和澳門（有時涉及中山）過去十年的發展時，幾乎所有被訪者都說，邊界北邊的發展更為迅速。如他們所記憶的景象：



2004 年初投入使用的澳門新邊檢站（新聞局圖片）

珠海過去非常落後，沒有瀝青路，祇有黃泥路。人口很少，大部分以漁業維生。成為經濟特區以後，珠海漸漸發展起來，建設了許多工業區，吸引了港澳和其它發達地區的投資。珠海吸納其它省份的移民越來越多，勞動力價格很低。

珠海過去有不少山，現在都被夷為平地，上面蓋了許多新樓。過去的道路兩旁，雜亂搭有許多鐵皮屋或木板鋪，現在早就不見了。道路也都重新修過。

除了國家和外商投資以外，被訪者將珠海的發展歸因於澳門人的消費，因此使邊界周邊地區首先得到發展。有一個小時候當過水客的被訪者說：

現在，大家都從珠海往澳門帶貨而不是從澳門往珠海帶貨了。這是過去十年中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進入澳門市場的國貨越來越多，有些在

澳門還很緊俏。澳門人喜歡在澳門不多見的珠海大商場或大百貨公司買東西。

一位被訪者說，澳人就是那樣把錢投到珠海的發展中去的。在談到珠海的發展時，被訪者還說，珠海政府具有“遠見卓識”，規劃得很不錯，從而使它在中國內地城市中顯得鶴立雞群：

珠海現在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綠色城市。過去它祇是一個一般的中國小鎮，現在已昔非今比，鳥槍換為大炮了。

被訪者提到的兩大變化，一是珠海和中山的道路和交通系統顯著改觀，二是環境和綠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沒有人對珠海的發展提出異議。

對於澳門的發展，批評就多了。許多被訪者抱怨澳門經濟相對滯後或增長緩慢，特別是在回歸以

前，失業率上昇，爭先恐後跨境消費，工廠搬遷，過份依賴旅遊和博彩業，都是嚴重問題。有些被訪者說，珠澳兩地的經濟水平在逐漸靠攏；其他人則仍然認為有顯著差異，主要是因為澳門更國際化，並享有特別行政制度。澳門在政治和管理領域成績斐然，政府比過去更貼近人民，建設專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澳門修建了許多新基礎設施，特別是在填海區。澳門的領域範圍不斷擴大，城市和邊界間已沒有田野和空地。除了地理上更接近外，澳門和珠海因新的高樓遍地而顯得日益相像。

填海建設被認為是影響澳門生活品質的一個要素，另外兩個是人口密度高，缺少公共綠地。然而，絕大部分被訪者仍一致認為，澳門的生活素質要比珠海的高。澳人在物質上更富有，並享受更多的自由。內地的工作環境、衛生條件和生活方式，都不可和澳門的相比，雖然一些地市的生活小區也營造出了相當高的生活標準。那些喜歡住在珠海和中山的人則說，那裡的物價便宜，貨源充足，而且空間和綠地更多——

住在中山比澳門好。說白了，中山的生活很輕鬆，澳門的生活壓力太大。澳門人大半時間都是在為養家活口打拚。這種生活方式中山人不習慣。

被訪者對生活質量看法不一，對生活方式分歧更大。有些人認為，兩地居民在生活方式、衣着、消費和娛樂方面存在顯着差別；另有人認為，生活方式幾乎相同，因為兩邊都是“中國社會”，“兩邊的人有空都喜歡卡拉OK或逛街購物”，“即便是兩地的價值觀都一樣，有錢生活才有質量。”毫無疑問，珠澳兩地的跨境接觸是非常密切的，並且互相影響。因此很多人認為差別正在日益縮小。

除了相互影響外，香港對珠澳兩地都有強烈的影響。那位中山被訪者對港澳的影響做了比較：

我想不出澳門在中山有甚麼影響，因為那裡的影響是受香港一統天下。絕大部分中山人收看香港電視。他們直接從香港獲取有關香港的資

訊，包括生活習俗、飲食文化和流行穿着。所以說，澳門對中山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人際關係方面，澳門似乎要比香港要看重。這也許是澳門和中山之間的交通方便造成的結果。

身份和人的概念

所有被訪者都被要求說說自己是哪裡人，如“澳門人”、“澳門華人”或“中國人”。這些問題常用來區別不同空間身份的重要性（德高雅，1997；仲，2004）。一個人一般具有幾重空間身份，哪國人、哪省人或哪個縣市的人，對於個人來說，重要性不盡相同。確認一個人對國家、地區甚至跨境身份的認同，有助於我們瞭解政治邊界造成的分化程度（桑德納、艾德 2002）。

在訪談中，絕大部分被訪者自稱中國人，理由如下：“我是在中國出生的。”“我爸是中國人。”“因為我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說：“因為澳門人和中國人沒有區別。”很多人強調，這種民族自尊心從來就沒有改變過，今後也絕不會改變。也有人談到了自己身份的改變。比如G女士住在內地時，就說自己是中國人，定居澳門後，就說自己是澳門華人，因為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有趣的是，有兩個人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提問者是誰。如果外國人問，那麼他們會答自己是中國人或澳門華人；如果內地人問，答案就是澳門人。這似乎是一個地理規模和區分提問者的問題。相當多的人把自己的國家和地方身份結合起來，說自己是澳門華人或中國澳門人。一位小姐解釋說，一方面，她把澳門看作“自己的祖國，感覺像自己的父母一樣。對澳門的感情要比對中國的強烈得多。”另一方面，她的大部分家人出生在中國，而且比較傳統，因此影響到她的身份認同。另一位被訪者想稱自己是澳門人，因為那會給他帶來一些好處，但是他不能那樣做，因為他是在中國出生的，於是他選擇了“澳門華人”這個身份。其他還有選擇澳門人或珠海人（雖然現在住在澳門）來表示自己身份的。唯一表明自己的身份發生了變化的，是一位土生葡人。他

說，1999年以前，他認為自己是葡萄牙人，現在愛用“土生葡人”這個身份。

鑒於許多人更喜歡表明自己的地方身份而不是國家身份的事實，我們想弄清澳門人和珠海人或內地人到底有甚麼區別。面對這個問題，絕大部分被訪者說，在他們看來，邊界兩邊的人沒有顯著區別，理由是：他們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或者“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而且我們還會說粵語。”然而許多人承認，根據穿着和言談舉止，區別澳門人和內地人並不難。有些人甚至補充說，澳門人一般都瞧不起內地人。他們還舉出眾多理由，其中不乏強烈的偏見。在一些個案中，就連那些自己是移民或聲稱對他人一視同仁的，其中包括兩個說自己是中國人和強調地方身份因素的，在訪談中也流露出對內地人的不滿。

內地人的特點，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沒文化，社會公德意識差，習慣不好，不懂欣賞。以下是一些原話：

- 和澳門人比內地人更無禮更自私。
- 他們的穿着品味極差，有時非常不禮貌。
- 大部分內地人喜歡騙人和小偷小摸。
- 他們吊兒郎當，亂丟垃圾，不注意個人面子。
- 不管幹甚麼工作，內地人的教育水準一般都比較低。
- 內地人一般都不講衛生，亂丟垃圾，隨地吐痰。
- 有些內地人靠做壞事賺錢，而大部分港澳人就不會這樣做。

很少有人直接在內地人的特點前添加如“吃苦耐勞”、“鍥而不捨”之類的褒義詞，也沒有人往澳門人之前添加貶義詞，如“懶惰”，“上班遲到”等。有人指出，澳門人對內地人的態度有所好轉，理由有三：1）接觸和通訊增多；2）內地的發展；3）內地遊客購買力的提高（這對澳門的經濟福利極為重要）。然而，“內地人的思維方式似乎有些不同”，珠海人和其他內地人沒有區別，這也許是因為許多珠海居民是外省人的緣故。這個事實，據一位被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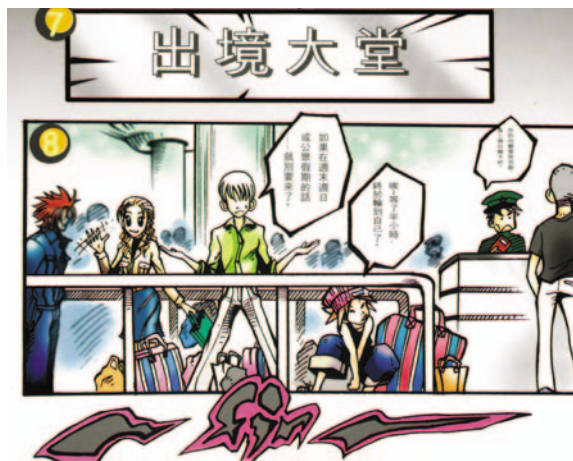
者說，削弱了彼此的瞭解，拉遠了距離。果然那樣，珠海的特殊地位和歷史就加遽了邊界的分化。另一方面，澳門和中山存在許多文化和親屬淵源，但是中山和澳門又被一條更明顯的城鄉分界線所隔開。這就解釋了訪談中提到的另一個問題，即內地的城鄉和貧富之間存在着巨大的鴻溝。一位被訪者對此進行了以下描述：

內地是富人腰纏萬貫，窮人沿街討飯，很多人發了大財，花錢如潑水，但尋常百姓仍然靠節儉度日。

為了使回答更加切題，我們還要求被訪者比較澳門人和內地人及香港人和內地人誰更親密。幾乎所有人都說，澳人要比港人更貼近內地同胞，當然近年來這兩種關係都在改善。雖然有人認為，香港和內地有更緊密的經濟紐帶，是促進關係密切的一個因素；另一些人則認為，其它因素比經濟關係更為重要，這些因素包括地理的毗鄰、跨境旅行的方便、中國人口的比例高、以及他們在鄰近內陸地區的諸多親朋好友、香港密切的國際聯繫（澳門人大多數依賴內地關係），以及更好的政府關係。此外，據說內地人更喜歡澳門人而不是香港人。“香港人總以為香港了不起，覺得香港比澳門和內地都好。”一位被訪者說，“很多香港人對內地缺乏瞭解。澳門的情況就不是那樣。”

“別拆這堵牆！”

這個小標題是引自於里根總統在推倒柏林牆前夕發表的著名演講。當時柏林橫着邊境，在很多（雖然不是全部）方面和澳門的情況類似。西柏林被牆圍着，雖然其居民可以相對容易地離開飛地，但他們在社會主義東德那邊的同胞卻不能輕易進入西邊。德國和澳門的一大差別在於：兩德當時並沒有涉及主權問題，祇是談論如何把牆拆掉，以便讓人自由流動。當然，可能有人意識到拆除邊界會帶來一定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問題，但在1989年機會降



一幅反映澳門海關情景的漫畫

臨之時，卻沒有人嚴肅地探討城牆保留的利弊。雙方都認為邊界限制了人的自由，東德人沒有享受資本主義飛地消費和五光十色生活的自由，飛地的居民沒有不經邊檢走出界外的自由。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被訪的澳門人中，居然沒有類似的情緒。雖然內地同胞祇是漸漸地被歡迎來分享澳門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但是澳門居民沒有特別感到行動受阻。當被問到是否覺得被邊界所困擾時，他們指出自己有旅行自由，而且也有旅行工具：“坐飛翔船到香港或珠海，可以說是易如反掌，而且澳門和世界各地都有聯繫，各種資訊唾手可得，我們絲毫沒有籠中鳥的感覺，澳門的生活很自由。”

澳門人習慣了做邊民。他們與邊界共存，並且利用邊界，毫無被隔離之感。

因此，絕大部分被訪者堅持保留邊界和邊檢站。祇有那位中山居民和兩位澳門居民說願意看到邊界被拆除。其他人則擔心拆除邊界後會引發治安、移民和勞務市場問題。以下是一些原話：

- 我擔心人潮會湧向澳門，衝擊勞務市場。
- 內地的犯罪團夥會潛來澳門，惡化本地治安。
- 我擔心內地的毒品問題會影響澳門青年。
- 人和人不同，生活標準也不同。邊界不能拆除。
- 邊檢應當加強，澳門特色應當保留。

—— 澳門將失去橋頭堡作用。那對澳門的影響就太大了。

—— 內地人會很快而且很容易就把傳染病傳給澳門人。

—— 內地游民會進入澳門，從事打砸搶等罪惡勾當。

—— 邊界不是屏障，而是特區政府的象徵。

—— 拆除邊界等於開門揖盜。

就連一位住在澳門但尚未獲得澳門身份證並把通關說成非常麻煩的內地移民，也不希望拆除邊界。她說：“治安會變得很差，因為人人都可以來澳門。很多內地貧民會到澳門來尋找發家致富的機會。澳門人的安全就難保障了。”

邊界被視為篩檢程式和護城牆而不是障礙。大家的意見是，這一篩檢程式或護城牆應當繼續保留，但其運作應當優化。比如2003年內地遊客入境人數的逐漸增加，被認為是對澳門經濟的支持，但是許多人覺得，遊客人數已經達到峰值。然而，無論反對進一步加速一體化的保守呼聲是多麼強烈，全體被訪者都讚同澳門與廣東省和珠海市的政府緊密合作。約有一半人對目前的政府間合作表示滿意，另一半建議政府在打擊跨境犯罪、推動旅遊和經濟、促進資訊交流和加快通關速度等方面加強聯繫。對於絕大部分澳門人來說，合作要加強，但也要保留邊界和澳門所擁有的包括特殊的城市、中國式風俗社會、後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邊境出入自如的特徵。

〔大部分資訊取自2003年4-10月對澳門人進行的訪談。訪談以粵語進行，引文按英文記錄改編。Siotou Ian, Yentle Lao, Cheng Cheng Ho 及 Kaori Shiu 不僅參加了採訪，對本次研究也提供了極大的幫助，特此感謝——筆者〕

【編者附言】讀者倘需要參考引文出處請看本刊外文版 *Revista de Cultura / Review of Culture* 第9期（2004年1月）頁16-17和頁29之參考書目。

郭頤頓譯